

# 20世纪以来李冰研究述论

◎ 李 钊 彭邦本

**【摘要】** 本文回顾和梳理了20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李冰研究的主要观点,并在对其简要评议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课题规划到微观的深入探究、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从研究旨趣到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提出了未来研究的一些思考,冀望对推动李冰研究的纵深拓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 李冰;都江堰;文化形象;中华文明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8)9-0036-11

## 一、问题的缘起

自李冰创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以来,岷江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润泽成都平原的能力不断凸显、增强,使成都平原及其周边的浅丘地区,在东汉时期即因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而荣膺“天府之国”的桂冠。<sup>①</sup>都江堰水利体系的工程模式及其蕴涵的深沉哲理,也在秦汉以来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而领导设计、修建这一举世无双水利工程的蜀守李冰,不仅是古蜀文明、华夏文明

的伟大继承者与创造者,也是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者,堪称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形象代言人。对于李冰创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丰功伟绩,历代蜀地行政官员、文人墨客以及地方百姓给予了高度评价。现存传世文献从汉代《史记》,到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直至民国《灌县志》等,几乎都不吝笔墨对其治水事迹广为记载。与此同时,官方与民间对李冰的感恩怀念,也很早就升华为对他的敬仰和神化。1974年,在都江堰渠首工程外江河道的疏浚过程中,发现了东汉时期李冰石

① 王双怀:《“天府之国”的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彭邦本:《天府之国的起源和形成——兼论先秦秦汉时期成都的崛起》,《先锋》2017年第12期。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李冰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李冰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 LBYJ2018-001)成果。

**【作者简介】** 李 钊,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39;  
彭邦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像,其题记曰:

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建宁元年(公元168)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sup>①</sup>

该条史料反映至迟在东汉中期之际,李冰已经被蜀地官民尊奉为神祇,以保佑蜀中水旱从人,风调雨顺。值得注意的是,这尊李冰石刻神像体量颇大,比常人高大得多,说明李冰神化的程度已相当高,其神化必然已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古人制祀,向来遵循“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的原则,且“非是族也,不在祀典”<sup>②</sup>。李冰正是这样御扞大灾大患,以劳定国、法施于民的伟大先贤。不仅如此,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他还进一步被塑造为关怀苍生,济世救困,力斩水妖,除暴安良的神圣形象,正式成为列入国家祀典的“川主”之神,成为全社会衷心拥戴以至顶礼膜拜的信仰神祇。<sup>③</sup>这些都充分揭示了李冰在广大巴蜀民众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都江堰时至今日依然焕发着“青春与活力”,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因而,它的生态工程模式,整体蕴涵的道法自然、天然合一的深沉哲理以及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意义,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和认同。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为四川省什邡县章山南麓李冰陵揭幕仪式专门题词:“创科学治水之先例,建华夏文明之瑰宝。”2000年,在澳大利亚的凯恩斯召开的联合国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都江堰水利工程与其紧邻的道教圣地青城山联袂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李冰入选四川十大历史名人之列,可谓实至名归。于

此同时,四川省李冰研究会和省级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李冰研究中心相继成立,计划定期开展多层次的研讨活动和学术会议,相关研究辑刊也即将推出,凡此种种,预示着李冰和都江堰研究已经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必将有力地推动学术研究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

学术研究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是,每隔一定时间或周期后,就需要进行学术回顾、总结,以梳理盘点成果,提出问题,昭示方向和来程。为了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李冰,深刻认识李冰创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及其蕴涵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我们在下文中回顾与梳理了20世纪以来学界研究成果,在对代表性论著主要观点简要盘点评议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课题规划到微观的深入探究、从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从研究旨趣到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提出了一些面向未来的思考,以就教于学界同仁,敬祈斧正。

## 二、李冰研究的主要内容述评

综合分析20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李冰的研究成果,从内容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一) 关于李冰籍贯、生平与家庭的研究

早期传世文献中李冰的记载首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但仅称其为“蜀守冰”,有名无姓。至东汉,班固《汉书》方始有“李冰”这一完整姓名,仍然籍贯、家庭信息全无,其生平业绩亦与《史记·河渠书》一样,仅有“凿离碛,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等文字寥寥的简略介绍。这就给李冰籍贯、生平研究造成了极大困难。

关于李冰的籍贯,迄今学界基本存在蜀人或蜀地羌人说、山西解州郊斜人说、蜀王杜宇一脉相承说以及不详说四种观点。<sup>④</sup>第一种观点发轫于

① 冯广宏主编:《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8页。

② 左丘明:《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

③ 彭邦本:《先民制祀的两个范例:妈祖和川主信仰的几点比较》,吴焯和主编:《慈心凤德·阿猴妈祖论文集》,台北:台北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267-279页。

④ 冯广宏等学者认为李冰的出身存在“蜀人说”和“山西人说”两种观点,参见冯广宏等:《都江堰创建史》,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106-110页,本文综合学界研究成果,认为存在四种观点。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蒙文通先生认为《华阳国志》所载“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是原始宗教巫师的说法,并由此判定李冰是蜀族之人;<sup>①</sup>任乃强先生进一步将这一观点明确化,认为李冰是“蜀族阳平地区生长的人,他的治水才能,只能从蜀族柏灌氏和开明氏世代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以改造发展而取得”<sup>②</sup>;其后,郭发明通过对汉人扬雄《蜀王本纪》<sup>③</sup>所载“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两条史料的解读,并结合蒙、任二位先贤的考证,提出了李冰是蜀地羌人的观点。<sup>④</sup>但冯广宏先生从时间背景、李冰的观念以及因果关系三个方面对这两条史料提出了质疑,认为李冰是“依靠军功步步提升的秦人”<sup>⑤</sup>。第二种观点提出的主要依据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李氏家谱》的发现。王大奇在对该家谱解读的基础上,结合金代泰和戊辰年(1208年)在河东李冰家庙(今山西运城解州镇郊斜村)发现的金石碑文记载,认为李冰是山西运城解州人;<sup>⑥</sup>张耕亦表达了类似的看法;<sup>⑦</sup>张长星通过对李氏族源的追溯,也认为李冰故里当在山西。<sup>⑧</sup>第三种观点主要以马白非、罗荣泉为代表。马氏沿袭清代陈怀仁《川主三神合传》李冰为蜀主鱼鳧裔孙之说,在《秦集史》中

称:“李冰者,亦不详其地望。或云:冰姓杜宇,号浮丘,蜀主鱼鳧裔孙;”<sup>⑨</sup>罗氏则推论李冰与杜宇是一脉相承的,因造福巴蜀人民而被川黔两地奉为“川主”。<sup>⑩</sup>第四种观点认为李冰的籍贯、生卒年不详。傅振伦、家有才、李树清、阮荣春等学者均认为李冰的籍贯及生卒年缺乏可靠的史料记载,且现有的考古发现不足以支撑李冰的具体生年和详细的籍贯。<sup>⑪</sup>

关于李冰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有子”与“无子”争论的“旋涡”之中。“李冰有子”论中,冯沅君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士大夫们相信李冰是个人,古代水利专家。田妇野老们相信他是个神,至少是个超人,能伏龙斩蛟。士大夫们不相信李冰斩蛟,却又无法抛撇民间传说的勇气,因将这件奇异的事实,归到他儿子身上。”<sup>⑫</sup>冯氏支持李冰有子,但未言及李冰之子的名讳。李静波、袁珂等学者认为李冰之子,即是民间传说中的李二郎。李氏认为李冰担任蜀守之后,与其儿子李二郎齐心协力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sup>⑬</sup>袁氏则根据《风俗通》李冰智斗江神的记载,认为后人或许感觉李冰“装饰其女”“沈江”的做法未免过于冒险,于是假设李冰的儿子二郎假扮美女,就婚于江神,然后父子同心协力和江神相斗,最终制服了江神。<sup>⑭</sup>李耀先、

① 蒙文通:《巴蜀史的时间问题》,《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9页。

②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

③ 《蜀王本纪》原本已佚,目前所存散见于后人所辑的文献中,其中尤以宋人李昉的《太平御览》所载最为详细。关于其作者,一说为三国时樵周(详见徐中舒:《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罗开玉:《“鳖灵决玉垒”纵横论——兼析〈蜀王本纪〉的写作背景》,《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等),本文姑从传统观点,即认为《蜀王本纪》为扬雄所作。

④ 郭发明:《李冰是蜀地羌人》,《文史杂志》1989年第2期。

⑤ 冯广宏:《李冰是蜀地羌人说质疑》,《文史杂志》1992年第3期。

⑥ 王大奇等:《“水利始祖”——李冰是山西解州郊斜人》,《沧桑》2001年第3期。

⑦ 张耕主编:《廉史鉴》,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⑧ 张长星:《李冰故里在山西》,《四川水利》2001年第4期。

⑨ 马白非:《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9页。

⑩ 罗荣泉:《李冰的神化与蜀王杜宇的冤案》,《贵州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

⑪ 参见傅振伦:《蜀守李冰治水事迹考略》,《说文月刊》第3卷第9期,1941年12月;家有才:《李冰父子和都江堰》,《山西水利》1994年第3期;李树清编著:《中国历代风云人物大观·先秦风云人物大观》,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472页;阮荣春,罗二虎主编:《古代巴蜀文化探秘》,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

⑫ 冯沅君:《元剧中二郎斩蛟的故事》,《说文月刊》(第3卷第9期),1941年,第124-130页。

⑬ 李静波:《李冰父子和都江堰》,《中国水利》1962年第21期。

⑭ 袁珂主编:《古神话选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2页。

祁少华等学者则支持“李冰无子”说：李氏经过考证认为，李冰之子李二郎是宋人附会之说；<sup>①</sup>祁氏结合文献记载，认为二郎神的原型当是蚕丛，而李冰的原型则是开明。<sup>②</sup>但从现存传世文献所载来看，《史记》仅载“蜀守冰”<sup>③</sup>，未提及李冰有子；清人严可均《全后汉文》所辑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佚文》转录李冰自述“吾自有女”<sup>④</sup>，未载其有子；同时，出土考古资料亦未发现关于李冰“有子”的确切证据。

综合来看，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大多是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推论。应该说，现有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尚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还不足以支撑李冰籍贯、生平与家庭状况的复原工作。因此，上述问题尚需可靠的文献资料和新的考古发现并结合民间传说予以详细考证。

## （二）关于李冰入蜀、守蜀时间考证

李冰入蜀、守蜀的具体时间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迄今无定论。造成这种学术困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现存传世文献所载不一。最早记载李冰任蜀守史迹的《史记·河渠书》云：“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sup>⑤</sup>，但缺载李冰守蜀的具体时间。成书晚于《史记》的其他文献留给世人“二说”：一说出自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秦昭王听田贵之议，遣

李冰为蜀郡太守；”<sup>⑥</sup>其后，北魏酈道元《水经·江水注》沿用了这一观点：“秦昭王以李冰为蜀郡守。”<sup>⑦</sup>另一说以《华阳国志》所载为据，该书卷3《蜀志》记为“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sup>⑧</sup>。第二，目前考古资料亦未发现李冰担任蜀守的确切证据。因此，学界关于李冰守蜀的时间，就相应地形成了秦昭襄王时和秦孝文王时两种说法。杨宽《战国史》<sup>⑨</sup>、林剑鸣《秦史稿》<sup>⑩</sup>、罗开玉《四川通史·秦汉三国》<sup>⑪</sup>、翦伯赞《中国史纲要》<sup>⑫</sup>等学者均持“昭襄王说”。由于此四种著作分别为学界较有影响力的断代史、国别史、地方史之专著以及通行之教材，而使此说成为学界普遍的看法。杨向奎经过对《史记》《华阳国志》等书的考证，认为李冰入蜀的时间当在秦昭王三十年之后；<sup>⑬</sup>赵世暹指出，李冰是在秦昭王晚年，即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间担任蜀守、并在此期间修建了都江堰及其附属水利工程。<sup>⑭</sup>赵氏这一观点得到沈起炜<sup>⑮</sup>、王云度<sup>⑯</sup>、张习孔<sup>⑰</sup>、姚汉源<sup>⑱</sup>等多位学者的赞许和采纳。杨继忠认为“蜀守冰是春秋时蜀国国君鳖灵”，司马迁将“蜀王鳖灵”写成“蜀守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司马迁不懂蜀语，在都江堰采访时将“鳖灵”误记作“冰”；东汉应劭受封建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而将“鳖灵”记为“秦蜀守”<sup>⑲</sup>；徐中舒以考古资料为据，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浩大，而秦孝文王在位仅一年，一年

① 李耀先：《二郎神考》，《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② 祁少华：《二郎神是李冰之子？》，《北京科技报》2004-01-11(A12)。

③⑤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2页。

④⑥ 严可均：《全后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38页。

⑦ 酈道元原注，陈桥驿注释：《水经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43页。

⑧ 常璩：《华阳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页。

⑨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2页。

⑩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9页。

⑪ 罗开玉：《四川通史·秦汉三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25页。

⑫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⑬ 杨向奎：《中国古代的水利专家——李冰》，《文史哲》1961年第3期。

⑭ 赵世暹：《李冰守蜀的年代问题——校正〈华阳国志〉误字所造成的混乱》，《文汇报》1962-04-27(A3)。

⑮ 沈起炜编著：《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72页。

⑯ 王云度编著：《秦史编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4页。

⑰ 张习孔，田钰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85页。

⑱ 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⑲ 杨继忠：《李冰是秦蜀守吗？》，《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

内不可能完成这一工程,秦昭襄王三十年之后,秦代对蜀地的控制渐趋平稳,李冰在这一时期修建都江堰是完全可能的;<sup>①</sup>冯广宏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推论李冰在公元前273年或稍后秦昭王时任蜀守;<sup>②</sup>徐亮工根据上个世纪70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大事记》的相关记载,推测李冰是在秦孝文王时担任蜀守的等。<sup>③</sup>

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对于李冰守蜀和修建都江堰的具体时间尚有分歧。但有一点必须指出,都江堰的兴建,既涉及水文气象、地质结构、建筑材料和生态环境等基本物质技术层面,又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人口等社会环境资源的支撑与制约,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想象,受限于两千多年以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认识,如果没有一位善于继承、熟谙水脉、乐于奉献、德才兼备的地方行政长官主持发动人民群众,在短时期内很难完成。因此,借助文献记载和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初步认定,都江堰及其附属水利工程是李冰在贯彻秦政府统辖蜀地的政治意图前提下,继承大禹、开明氏等先辈成功治水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蜀地特有的地理构造、充分利用川西平原的砂石、木材、竹子等建筑材料,积极发动人民群众修建而成的;同时,在完全依靠人工“火燎水激”近乎原始的劳动方式下,这一过程至少需要十至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由此看来,李冰守蜀的时间应该不会短于十五年。

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李冰离任蜀守的时间及原因。参稽文献,史亦无明文。冯广宏曾以1979年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公社出土的秦戈

所刻铭文“二年,上郡守冰造”推测,李冰在始皇二年(前245年)已调离蜀守之位。<sup>④</sup>但据黄盛璋所考,以年代相接的三年上郡戈其守亦名冰,而始皇三、四年,上郡无守,故由相邦吕不韦监造。上郡冰监造的二、三年戈不应是始皇在位时期。纳林公社出土的秦戈铭文所刻“二年”当为秦昭王时,即公元前305年,而此时张若出任蜀守,故冯氏之说未安。<sup>⑤</sup>至于李冰离任原因,甘章成认为李冰任蜀守后期,年迈体衰,在带领群众“导洛”“治绵”的工程中,因积劳成疾,劳累过度,死于什邡的水利工地上,<sup>⑥</sup>但此说未能深入论证。因此,关于李冰入蜀和离蜀的时间、原因依然是学界未来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 (三)关于李冰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研究

在历代盛称的“李冰治水”系列活动中,李冰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关系无疑是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因此,学界关于李冰与都江堰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傅振伦综合《史记》《汉书》等文献的记载,对李冰治水的史迹以及历代对李冰治水之法的继承与演变状况予以了考证;<sup>⑦</sup>谢忠梁认为李冰是在继承蜀地羌氏等少数民族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sup>⑧</sup>许肇鼎结合文献记载和蜀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指出,《史记》所载李冰凿离堆的所在地在灌县而不是雅安或者乐山;<sup>⑨</sup>张勋燎以考古资料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原理为据,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李冰当年所凿的离堆,不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说的今灌县城南的宝瓶口离堆,而是距现在都江堰尚有相当距离的另外一个小山堆。现在宝瓶口的形成,是公元十世纪以后的事,和李冰凿离堆并无

① 徐中舒:《古代都江堰情况探原》,《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

②④ 冯广宏:《李冰任蜀守年代新考》,《天府新论》1985年第3期。

③ 徐亮工:《李冰入蜀时间考》,《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黄盛璋:《新出秦兵器铭刻新探》,《文博》1988年第6期。

⑥ 甘章成:《李冰的不朽功绩》,《水利天地》1996年第3期。

⑦ 傅振伦:《蜀守李冰治水事迹考略》,《说文月刊》(第3卷第9期),1941年。

⑧ 谢忠梁:《关于都江堰历史的两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75年第3期。

⑨ 许肇鼎:《漫谈四川的离堆——兼谈〈史记〉所载李冰凿离堆所在地》,《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77年第3期。

直接的联系；”<sup>①</sup>刘琳综合诸书记载，认为李冰所凿离堆当是乐山凌云山大佛崖；<sup>②</sup>喻权威考证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体系之中的宝瓶口和沱江是李冰之前蜀地人民开凿的，<sup>③</sup>但王纯五、金永堂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鳖灵凿宝瓶口、李冰修都江堰应是符合史实的；<sup>④</sup>田尚等学者认为《史记》《水经注》等文献关于李冰创建都江堰及其附属水利工程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sup>⑤</sup>徐中舒从蜀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角度指出：“都江堰工，创始蜀人，他们就地取材，创造竹络笼口，筑堤坝，分水势，灌田畴，种水稻。李冰守蜀后，依其成法，守其规模，使川西平原成为沃野……这是四川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是科学地适应物质条件的精心创造；”<sup>⑥</sup>郭声波认为李冰作大堰、凿离堆，引江水入郫江，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当时的成都航运；<sup>⑦</sup>周九香认为目前尚无可靠地史料记载李冰修建都江堰的确切年代，但把公元前256年定为兴修的时间上限是比较恰当的；<sup>⑧</sup>彭邦本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认为都江堰是分为渠首工程和广布于川西平原的航运灌溉系统两大部分，是由李冰继承大禹以来蜀地水利优秀传统，并融合中原先进治水经验的集大成之杰作等。<sup>⑨</sup>

综合来看，学界尽管对李冰修建都江堰的附属水利工程，以及离堆开凿的具体地点甚至时间尚存歧见，但对于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主要包括修建都江堰渠首主体工程、尤其是凿离堆和穿二江航运、溉田等方面还是基本达成了共

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都江堰是人类充分利用自然地质结构、遵循水文原理、并在不断形成的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理念指导下修建和逐渐得以完善的科学体系。从这一角度分析，尚有诸多问题需要学界的进一步深入讨论，例如李冰是如何利用当时先民的智慧修建都江堰这一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的？李冰是如何发动人民群众修建都江堰的？除了贯彻秦政府对蜀地的政治策略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促使李冰修建了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历代王朝是如何贯彻、发展和丰富李冰治水理念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与岁修制度的逐步完善，对蜀地社会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如果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角度分析，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创举，它与同时期以及现代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利工程设施相比，体现出了怎样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它在世界水利发展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它是如何将水利科技与道家自然、天人合一的人文理念、精神深度融为一体的？它的工程模式、文化理念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有何典范和借鉴意义？这些都是李冰和都江堰研究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 （四）关于李冰历史贡献的研究

学界关于李冰历史贡献的研究基本上围绕李冰的治水功绩以及都江堰的科学价值而展开。20世纪40年代马兆骧对李冰的历史贡献首次做了全面总结：李冰修建都江堰创造了笼石筑堤法与杓槎节制流量法、留给世人治水六字诀、从而“利济

① 张勋燎：《李冰凿离堆的位置和宝瓶口形成的年代新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② 刘琳：《离堆辨》，《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期。

③ 喻权威：《宝瓶口和沱江是李冰之前开凿的》，《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

④ 王纯五，罗树凡：《都江堰确为李冰所建——与喻权威同志商榷》，《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6期；金永堂：《鳖灵凿宝瓶口，李冰修都江堰》，《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6期。

⑤ 田尚，邓自欣：《关于兴建都江堰的几个历史问题》，《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

⑥ 徐中舒：《古代都江堰情况探原》，《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

⑦ 郭声波：《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历史演进》，《中国历史地理文丛》1992年第4期。

⑧ 周九香：《试论都江堰修建和李冰崇拜》，《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⑨ 彭邦本：《从大禹到李冰：上古水利理念初探——以古蜀治水史迹及其影响为中心》，《纪念都江堰建堰226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选编》，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第146-152页；彭邦本：《上古蜀地水利史迹探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

蜀人”；<sup>①</sup>张幼山认为李冰是我国古代最为卓越的治水专家；<sup>②</sup>甘章成指出：李冰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大力兴修水利、开拓水陆交通、以及创建盐井诸陂池工程，造福蜀中大地等方面；<sup>③</sup>冯广宏对都江堰水利工程创建前后蜀地农业生产在全国的地位进行了比较，从而凸显其贡献和意义；<sup>④</sup>李映发考察了都江堰水利技术在我国历史上的传播与当今的治水价值；<sup>⑤</sup>邹礼洪探讨了李冰修建都江堰所体现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行为；<sup>⑥</sup>秦秦脊认为秦政府选派李冰担任蜀守修建的都江堰是支撑秦国完成统一的三大水利脊梁之一；<sup>⑦</sup>邓正龙等学者认为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所折射出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是中华民族最光辉的文明成就，位居所有世界文化遗产之首；<sup>⑧</sup>谭继和认为李冰创建都江堰为蜀文明作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sup>⑨</sup>

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对李冰的历史贡献主要侧重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与蜀地农业经济的繁荣之间的关系。相形之下，对于李冰与中华文明的演进、李冰修建都江堰所折射出的哲学思想以及都江堰科学原理在世界文明体系构建中的历史地位尚缺乏深入的考察和论证。目前，世界正走向多元一体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脱离这一趋势而独立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文明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重新解读、认识中国文明，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世界人民认识中华文明对世界

文明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因此，李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最佳文化符号载体，尚有诸多问题需要思考，例如，李冰及其兴建的都江堰代表的水文化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演进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何让世人更为广泛地了解李冰治水所蕴含的文明因素？如何实现李冰与世人的“隔空对话”？等等，尚需我们在认真研究李冰其人其事的扎实基础上，进而就李冰和都江堰、李冰文化对中华文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作出更加深入而富有新意的学术研究。

#### （五）关于李冰文化的研究

关于“李冰文化事项”的研究，罗荣泉在考察杜宇治水史迹的基础上，认为川黔两地人民因李冰其筑堰造福巴蜀而将其尊奉为“川主”，永享祭祀；<sup>⑩</sup>罗开玉从李冰建堰借助蜀神、都江堰的建堰民族构成以及建堰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蜀文化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与蜀文化的关系；<sup>⑪</sup>周九香认为蜀人对李冰的崇拜是同都江堰在现实经济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成正比发展的；<sup>⑫</sup>干树德指出，李冰之子李二郎是借助李冰治水事迹而转化成的，二郎神的崇拜是民间综合多种传说的结果；<sup>⑬</sup>李耀先认为历史上本无其人的“李二郎”在宋代取得“合法”地位，与李冰共同享受祠祭，且形象逐渐氏羌化，是民族和睦相处与文化交融的政治反映；<sup>⑭</sup>焦杰认为，二郎神是晚唐或五代时由李冰治水的故事衍生而来，因

① 马兆骧：《李冰治水之伟绩》，《说文月刊》第3卷第9期，1941年。  
 ② 张幼山：《李冰——卓越的古代治水专家》，《水利天地》1987年第4期。  
 ③ 甘章成：《李冰的不朽功绩》，《水利天地》1996年第3期。  
 ④ 冯广宏：《李冰创建都江堰的历史启示》，《文史杂志》2000年第4期。  
 ⑤ 李映发：《都江堰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发展》，《四川水利》2005年第6期。  
 ⑥ 邹礼洪：《从石刻碑铭看都江堰历史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国农史》2008年第4期。  
 ⑦ 秦秦脊：《支撑秦国兴盛的水利脊梁》，《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5期。  
 ⑧ 邓正龙，张宁生：《中华民族最为光辉的文明成就——都江堰水利工程及其核心价值》，《今日中国论坛》2013年第7期。  
 ⑨ 谭继和，郭潇雅：《李冰：为蜀文明作奠基性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14-03-28(A5)。  
 ⑩ 罗荣泉：《李冰的神化与蜀王杜宇的冤案》，《贵州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  
 ⑪ 罗开玉：《论都江堰与蜀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  
 ⑫ 周九香：《试论都江堰修建和李冰崇拜》，《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⑬ 干树德：《也谈二郎神信仰的变化》，《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⑭ 李耀先：《二郎神考》，《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得到统治者的提倡,在北宋中后期被引入道教系统;<sup>①</sup>申及甫结合都江堰出土的东汉石像以及民间传说,认为李冰由人到神,原本属于古代宗教人造神的祖先神类型,客观上起到了传扬李冰伟大功业的作用;<sup>②</sup>周述椿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是大禹、鳖灵等古蜀人集体文化智慧的结晶,李冰则是这种文化智慧的集大成者,这充分证明了蜀文明在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先进性;<sup>③</sup>干鸣丰认为以大禹、李冰父子、赵昱等为川主的民间信仰是一种以治水文化为核心内容,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形式,以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为主体的文化事项,在四川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sup>④</sup>郭祝崧认为李冰的神化,原属“祖先神”遗制,自民间宗教观念盛行之后,旋即被道教作为道仙,李冰及其子李二郎皆属“人造神”;<sup>⑤</sup>李映发认为李冰精神集中体现在勤于职守、做事科学、实干作风以及富于开拓进取创大业等方面,造就了都江堰特有的水文化事项;<sup>⑥</sup>王世伟等学者从都江堰放水仪式的缘起、仪式的自然生态关联、官方仪式的社会叙事、仪式现有文化景观等方面讨论了都江堰放水仪式的文化内涵;<sup>⑦</sup>吴萌认为李冰治水故事被神化既是官方凝聚人心治水的需要,也与肇始于先秦的水神崇拜有极大的关联。<sup>⑧</sup>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于李冰文化的研究主要围绕李冰信仰文化而展开,李冰文化事项应该是一个以李冰治水的科学认识、继

承与创新精神、为官之道、乐于奉献精神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同时也是世界文明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未来关于李冰文化展开的学术研究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几点:第一,李冰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研究;第二,李冰人文精神研究;第三,李冰科学精神研究;第四,李冰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第五,李冰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策略(途径)研究;第六,李冰文化与世界文明的构建研究等。

#### (六)关于李冰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自1974年、2005年、2014年都江堰在岁修过程中先后发现李冰石像以来,学界加强了对李冰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蜀勃首次对东汉李冰石刻像的性质、功能作了解读;<sup>⑨</sup>四川省灌县文教局对东汉李冰石像出土的时间、地点、肖像特征、石像刻字予以了分析;<sup>⑩</sup>王文才结合文献资料对李冰石像的刻字、石人作用及其行政职位进行了解读;<sup>⑪</sup>唐光沛提出了几条重要观点:李冰石像题记“三神石人”当是李冰、大禹和开明;李冰石像与水文测量的关系值得商榷;李冰石像当是江边祠庙的祭祀对象,由于洪水冲毁祠庙而沉于河底;<sup>⑫</sup>温玉成则认为李冰石像刻字中的“三神”可能是管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水官;<sup>⑬</sup>张剑从书法角度认为李冰石像刻字隶书属于桓灵书风,体现了东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风气;<sup>⑭</sup>周九香对李冰石像的三条铭刻文字逐一作了解释:“故

① 焦杰:《灌口二郎神的变化》,《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② 申及甫:《李冰由人到神成因探析》,《文史杂志》2003年第1期。

③ 周述椿:《论都江堰水利工程表明的古羌、蜀文化的先进性》,《文史杂志》2003年第2期。

④ 干鸣丰:《简论川主信仰及其历史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⑤ 郭祝崧:《李冰神化过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

⑥ 李映发:《李冰精神与都江堰文化》,《四川水利》2004年第5期。

⑦ 王世伟,王友福:《都江堰放水仪式解析》,《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

⑧ 吴萌:《李冰神化的原因探析》,《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

⑨ 蜀勃:《东汉石刻李冰像在都江堰出土》,《光明日报》1974年6月6日。

⑩ 四川省灌县文教局:《都江堰出土李冰石像》,《文物》1974年第7期。

⑪ 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文物》1974年第7期。

⑫ 唐光沛:《关于李冰石像的几个问题》,《文物》1984年第1期。

⑬ 温玉成:《说李冰石人题刻的“三神”》,《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⑭ 张剑:《从东汉李冰石像谈起》,《文史杂志》1991年第5期。



蜀郡李府君讳冰”，“府君”是郡守的通称；“都水掾”相当于今天的水利局；“珍水”当为“献水”（供水之意）；<sup>①</sup>李绍明认为都江堰先后出土的四尊石人像，其中一尊为李冰像，其余三尊为神像。它们的功能既有纪念和祭祀李冰的性质，又有借助神性镇水的目的；<sup>②</sup>吴晓玲等人对目前三次出土的都江堰石人像进行了综合比较，认为2014年出土的无头石像可能是李冰所立，如能证实，则可佐证李冰高超的治水智慧；<sup>③</sup>2013年天府广场东北侧四川大剧院考古工地中心出土了一头石兽，林向认为其“身份”可能是《华阳国志》所载“李冰作石犀，以厌水精”中的石犀；<sup>④</sup>陶禹则认为《华阳国志》所记“李冰作石犀，以厌水精”，是后世附会之辞，不可能发生在战国末期的蜀地。<sup>⑤</sup>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自1974年都江堰渠首工程维缮过程中发现李冰石像以来，尽管学界加强了对李冰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但尚有诸多讨论的空间。从学术研究的资料角度分析，李冰研究至少需要对三个方面的资料进行科学地整理与研究，即现存传世文献资料关于李冰和都江堰的记载、李冰和都江堰考古资料（包括出土文字资料）以及围绕二者的学界既有研究成果。

### 三、未来的研究思考

根据以上的简要叙述和评议，可以看出，20世纪以来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和探讨李冰，并提出了很多蕴含学术价值的见解，丰富和拓展了李冰研究的学术空间，在相当程度上为李冰研究的继续深入奠定了基础。回顾过去，放眼未来，我们认为日后关于李冰的研究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几

点：

第一，宏观层面的科学规划。20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李冰的研究基本上以1974年东汉李冰石像的出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注重运用文献资料印证民间传说中的史实实地；后期则在对李冰石像考证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相互印证的解读。可以说，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李冰研究的走向，成绩可喜，不过还存在巨大的探索空间。李冰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相对分散”的研究格局，制约了研究的系统深入发展，不能形成李冰研究的系统化，也就不能充分展现李冰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四川省李冰研究会”“四川省李冰研究中心”和“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团体以及四川省水利厅、都江堰管理局等行政机构很有必要加强合作，联合拟定《李冰研究课题规划》，以便对李冰展开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这对于进一步深度挖掘李冰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和深刻丰富意涵、建设有巴蜀底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微观上的深入探究。除了宏观上的课题规划指导，微观上的深入探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兹举一例为证：作为蜀地文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重要贡献者得李冰，却史无传记：开创正史先河的《史记》只是在《河渠书》简单提及：“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sup>⑥</sup>；其后《汉书·沟洫志》在“冰”之前加了姓氏“李”；<sup>⑦</sup>《华阳国志》作为专录巴蜀史迹的地方史志，也没有单独为李

① 周九香：《东汉李冰石像题铭浅析》，《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② 李绍明：《都江堰渠首出土汉石刻人像探讨》，《四川文物》2008年第2期。

③ 吴晓玲，王向华：《都江堰发现无头石人像，或为李冰治水所立》，《四川日报》2014年4月25日。

④ 王嘉：《摸到它就摸到李冰的手》，《成都日报》2014年5月11日。

⑤ 陶禹：《李冰石犀厌水辨》，《古代文明》2016年第3期。

⑥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2页。

⑦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7页。

冰作传,只是在前二书的基础上增加了李冰蜀地治水的具体事迹。<sup>①</sup>三书记载所传递出的信息显然不符合我国自古以来“史之为务,申以为劝诫,树之风声”“史之为用,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传统,<sup>②</sup>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话题,但至今尚无专文论及,更无一部较为完整的李冰传。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缺乏大量具体细致的深入研究成果为基础。

第三,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目前造成李冰研究最大的学术困惑之一就是资料的匮乏。一方面,现存传世典籍文献关于李冰的记载相对阙如。从史料价值角度分析,李冰生活在先秦时期,这一时期关于其“史迹”的记载应最具说服力。但证诸现存史乘,成书于李冰年代的记载基本为零,而稍晚的汉代文献亦极其简略;汉以后至明清阶段的文献,李冰“史迹”亦仅散见于零星记载,很不系统。这就为我们从文献方面深入研究李冰造成了极大的学术困难。另一方面,一个时期以来东汉李冰石像等考古资料的出土,为李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学界及时给予了报道、公布与探讨,但还缺少有组织的系统整理研究。但如果不对这些不同时间出土的考古资料及时人陆续研究的成果进行系统的整理,那么它们就容易停留在碎片化的遗憾状态,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学术效用。因此,很有必要对李冰现存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进行系统性的综合整理与研究,为学界持续深入开展李冰研究提供基础性的资料。同时,李冰文化内涵深厚,从精神层面分析,可以高度概括为廉政为民的奉献精神、继承与创造的奋斗精神以及道法自然的科学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意义和现实作用。因此,加强李冰文化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表层的陈述性解释,还应当深度挖掘其精神哲理内涵及其当代

价值,以育人资政、传诸后世。

第四,研究旨趣的拓展。李冰和都江堰在相当程度上是同一课题的两种表达方式,整体考察李冰文化和都江堰文化形成的内在机制或者说内在规律性日渐成为研究者的共识。纵观20世纪以来关于李冰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将李冰与都江堰分开研究和断代史的研究成果居多。这种范式虽然能揭示出某一历史发展阶段李冰文化和都江堰文化的表象及其史实,但并不能充分和深刻地展现李冰文化和都江堰文化及其发展变化的整体有机衔接和内在联系。李冰兴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以至都江堰灌区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整个川西平原及其周邻浅丘地区社会历史的缩影,也可以说是我国整个传统社会发展的一个见证,因此,现在很需要一部社会史、整体史视角的都江堰史。如果局限于断代史的研究视野或者将李冰文化与都江堰文化“割裂”开来进行研究,显然不能充分揭示出这一蜀地特有的巨大广义文化事项的产生、形成及其内在合理性。因此,从整体性考察李冰文化和都江堰文化的演变以及历史时期围绕二者形成的“蜀地水文化”才能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

第五,理论基础的构建和创新。在我国传统社会,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的发展呈现辩证互动的关系。纵观历史,虽然李冰文化与都江堰文化归根结底是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但没有哪一区域经济像成都平原一样,更为如此近乎完美地受到水文明、水文化和属于水文化的水利科技的滋润呵护,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水文明代表的文化如此水乳交融,因此,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史观深入考察历史上的这一典型个案,从理论上深刻阐明其因果道理。同时,人类社会发 展至今,也面临发展模式走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困境等众所周知的诸多问题亟待求解,李冰创建的都江堰长葆青春的工程模

① 常璩:《华阳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② 刘知机:《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0-143页。

式,尤其是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深层哲理,无疑可以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丰富的智源和深刻的启发,这就需要我们z从理论上加以深刻总结和演绎阐发,为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做出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提供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借鉴和指导。

第六,研究方法的丰富。李冰主持设计修建的都江堰,自秦汉以来造就了天府之国,至今仍然对成都平原以至更广阔地域的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的全方位发展产生不断增长的效益,这就不只是水利科学和历史学的对象,而应成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课题。因此,多学科的理论、方法,都应该整合进研究课题和领域中来,展开多面相、多层面和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在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尤其要注意将研究主要集中在水利、历史以及考古,向文学、哲学、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拓展。同时,要立足巴蜀和中国,放眼世界,都江堰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风雨,至今却依然高度发挥着实际效用的无坝引水大型水利工程体系,折射着闪耀全球的科学原理和中国智慧。如何让这种科学原理和中国智慧走出国门,让世人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列宁关于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断带给我们诸多启示:“注重于尽量确切地把两件事研究清楚,使它们彼此对照显现为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

同的阶段,而特别是注重于同样确切地把一整批连续的相当状态,它们的一贯交替以及各个发展阶段间的联系都研究清楚,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思想。”<sup>①</sup>因此,将都江堰水利工程与历史时期国内、国外著名水利工程作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或许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从国际化角度分析,都江堰的知名度远远高于李冰,诚如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马燕生先生所指出:国外除了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家之外,英、法、美等欧美国家的学者更为熟知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而对其创建者李冰却知之甚少。通过将这张世界名片与历史时期国外著名水利工程的横向比较研究,使国外学者在了解都江堰及其所蕴含的中国智慧的同时,激发对都江堰的伟大创建者——李冰及其文化事项的兴趣,从而带动、推广对李冰、李冰文化的学术研究。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都江堰及其系列水利工程的修建,实际上蕴含着从大禹时代、到开明时代、再到李冰时代蜀地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付出。都江堰水利工程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依然“福泽蜀地”“润泽中华”,也包含着历朝历代对其维缮和管理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是中国智慧的集中展现和人民群众的汗水凝结,集中以李冰为象征,并非一人一时之功。这一点也是我们推动李冰研究向纵深拓展不能忽视的又一问题。

(责任编辑 杨丽华)

① [前苏联]列宁:《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北京: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第124页。